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

北京市农民工生活方式五年间转变的实证研究

纪 韶, 李舒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6)

摘 要: 用2004年和2009年以同样的方法对在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的调研数据, 分析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中的问题, 提出了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关键词: 城市化; 农民工; 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2-0020-07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ifestyle Change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in Five Years

Ji Shao, Li Shu-d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We conducted the survey on the migrant workers' lifestyle in the same way in 2004 and 2009.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d that the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process of lifestyle chang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At last, we summarize three phases in the change of migrant workers' lifestyle and put forward the ultimate mode of migrant workers' lifestyle.

Keywords: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 lifestyle

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说明: 城市化的完成质量是通过人们选择一定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的^[1]。在城市化进程中, 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地域间的转移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完成标准, 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真正融入和认同是城市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对此, 我们在2004年11月, 对北京市农

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建筑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进行了“北京市农民工生活方式状况的调查”。近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有了哪些转变? 2009年5月我们原路返回, 以同样的方法进行了跟踪回访; 本文对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五年来生活方式的转变数据进行对比性实证研究。

收稿日期: 2009-07-22; 修订日期: 2009-1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09BJL020);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创新人才项目资助 (PHR200906120)。

作者简介: 纪韶 (1954-), 女, 辽宁沈阳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力市场理论和政策研究。

在理论上,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研究层面分为个人、群体、社会三个层面,研究层次分为经济、社会、心理层面。对生活方式的分析边界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生活方式的内容去界定。对广义的生活方式的分析应该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家庭生活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乐”^[2]。考虑到农民工目前生活水平现状,我们的调研和分析定位在狭义的生活方式,即对在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消费方式等生活方式转变的基本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一、北京市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

1. 农民工文化程度变化的对比

两次调查的有效问卷各为 600 份,调查对象都是年龄在 18~55 岁之间在北京务工的农民工。2004 年被抽样调查的农民工男性占 35.90%,女性占 64.10%;2009 年被抽样调查的农民工男性占 49.5%,女性占 50.5%。2004 年被抽样调查的农民工小学及小学以下的文化占 12.3%,初中文化的占 60.9%,高中文化的占 17.8%,专科占 6.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2.2%;2009 年文化程度的变化为:13.0% 为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52% 文化程度为初中文化,21.5% 为高中文化,10.2% 为专科及技校,3.1% 为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数据显示:在京就业的农民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在增加。

2. 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变化的对比

调研数据说明:2004 年家庭年收入为 1 万元以下的农民工数量比例为 64.24%,2009 年这一比例降到了 27.66%;2004 年家庭年收入为 1~2 万元的农民工数量比例为 24.67%,2009 年这一比例升到了 40.56%;2004 年家

庭年收入为 2~3 万元的农民工数量比例为 8.6%,2009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17.20%;2004 年家庭年收入为 3~5 万元的农民工数量为 2.49%,2009 年这一比例升到了 14.58%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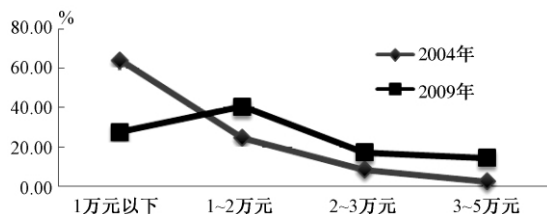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变化对比

从图 1 看出:①农民工年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在发生变化。五年来,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为 1 万元以下的数量降低了 36.58%,家庭年收入在 1 万元以上的比例增加 15.89%,家庭年收入为 2~3 万元之间的比例增加了 6.6%,家庭年收入为 3~5 万元的比例增加了 12.09%,占家庭年收入的 65% 左右。②支持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原因是我国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近五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把握宏观调控运行机制使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保障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权益,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使农民工技术素质不断提高。北京市政府加大投入城市公共支付成本,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在京的教育负担问题,不断提高在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等。这是在京就业的农民工收入逐步提高的重要原因。③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由技术差异导致的。无技术的农民工在就业中只能做通用工种,收入较低;而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可以从事汽车修理、家电维修等高级技工工作,收入增长较快。但大多数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属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流动性强且积累少,仍属于就业的弱势群体。尽管农民工收入在逐步提高,但与北京市在职职工工资收入比较,无论是在绝对数额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北京 2009 年的最低工资线为每月 800 元,家庭总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农民工的整个家庭经济

收入几乎只接近北京市最低收入线，而这一比例现在依然有 27.66%。

3. 农民工家庭消费生活方式变化的对比

消费生活方式是指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耗消费资料，由消费的方法和消费结构构成。消费生活方式的评价标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消费性质、消费习惯和消费的发展趋势。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流通是封闭的，农民的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给自足，农村社会服务业落后，农民生活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由于农村的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事业不发达，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也较低。上述原因导致农民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同质性，由于长期积淀而形成了一种封闭型的风俗习惯。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农民的思维和视野开阔了，不再满足纯物质生活的消费，开始关注精神和服务消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由封闭的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方式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生活方式转变，从下面几组数据的对比我们看到在京就业的农民工消费生活方式的变化。

(1) 农民工在京消费的金额有所增加。农民工月消费金额在五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2004 年在北京农民工月消费金额不足 400 元的比例为 52.62%，2009 年该比例减少到 20.22%，比 2004 年减少了 32.4%；五年间，月消费金额在 401~600 元之间的农民工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着 8.99%；2004 年在北京农民工月消费为 601~800 元之间的为 22.66%，2009 年增加了 9.55%；2004 年月消费在 801~1000 元之间的农民工为 9.74%，2009 年为 15.92%，比五年前增加了 6.18%；2004 年月消费金额在 1000 元以上的农民工为 5.99%，五年后为 22.66%，比 2004 年增加了 16.67%。在北京农民工消费金额的增加与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正相关，现在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约有 500 万人，加上家属约有 1500 万人，农民工城市化将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

(2) 农民工消费习惯在不断改善。2004 年 71.21% 的农民工只是追求吃饱，而 2009 年这一比例降到了 32.34%，下降了近 40%；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口味的合适和营养的均衡，这两者上涨的比例分别为 8.97%、23.93%；而追求新潮的农民工和有其他饮食习惯的农民工虽然还很少，但也分别有 3.74% 和 2.24% 的增长。这说明农民工已经不再停留在吃饱的阶段，他们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农民工消费观念在不断的更新。从图 2 看出农民工购物决策影响因素发生了变化。2004 年有 56.76% 的农民工在购物时只选择质量过得去的商品，2009 年这一比例依然保持 53.38%；2004 年消费注重名牌的农民工仅有 4%，2009 年这一比例上升了 14.88%，达到了 18.88%。在农民工购物决策影响因素的其他方面，选择比重都有所下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变化是在人均 GDP1000 美金以上。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生活方式转变的经济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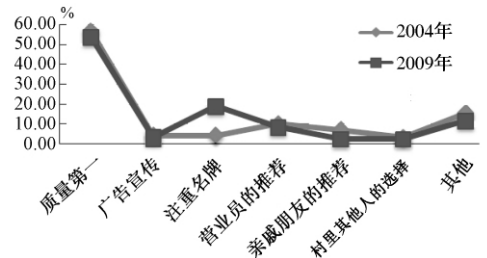


图 2 农民工购物决策影响因素对比

(4) 农民工消费水平在逐步提高。在农民工主要购物地点的变化方面：2004 年有 61.31% 农民工会在集市或早市购物，2009 年这一比例为 23.41%，下降了 37.9%；2004 年以附近小店作为主要购物地的农民工为 15.14%，2009 年这一比例减为 11.42%；2004 年以地摊作为主要购物地的农民工有 8.22%，而 2009 年这一比例为 5.99%；2004 年去大商场或大型超市购物的有 13.83%，2009 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 56.3%；2004 年农民工在其他地点购物的比例为 2.5%，2009 年这一比例为 2.88%。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民

工购物地点变化的经济基础。

(5) 农民工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在问卷中,我们对农民工消费结构变化的调查采用多项选择的方法完成。从图3看出食品(调研定义为生活中的主副食品)仍是大部分农民工的主要消费支出之一,农民工们还需要拿出大笔开销才能解决温饱问题;烟酒支出上升了4.97%,反映了农民工在收入上涨的同时,消费虽然逐渐多样化,但生活方式还不是处于健康的状态;11%的农民工的娱乐支出上涨了,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在提高。五年来,一方面,农民工家庭文化教育的内容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免去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费,对在京就业的农民工的各种免费培训力度不断加强,使得农民工教育支出额度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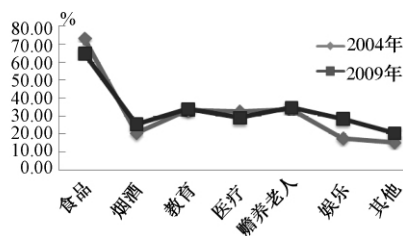


图3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对比

4. 农民工家庭闲暇生活方式变化的对比

闲暇生活方式简单说是人们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休闲活动的方式。闲暇生活方式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伴而行的。我们主要考察了农民工在其闲暇时间,即完成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和工作任务,满足了吃饭、睡觉等生理需要后,剩余下来可供自己支配时间中的主要活动。

在农民工家庭闲暇生活方式变化方面:2004年将看书作为主要休闲方式的农民工比例为34.16%,2009年该比例增加到38.42%,五年来增加了4.26%;虽然学习专业技术依然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主要休闲方式,将学习专业技术作为主要休闲活动的农民工一直以来都没有超过15%,调查显示2004年该比例为9.94%,2009年该比例有了一定增长(2.86%)。看电视、聊天这两种休闲方式一直占据着农民工休闲活动的主要地位,2004

年将看电视作为主要休闲方式的农民工比例为69.64%,2009年该比例为70.4%;2004年将聊天作为主要休闲方式的比例为47.25%,而2009年该比例为44.63%;将打牌作为其主要休闲活动的农民工有微小下降,2004年该比例为17.31,2009年该比例为16.11%。

5. 农民工家庭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变化的对比

我们用农民工的交友对象为依据来考察农民工社会交往生活方式转变。从图4看到在农民工的交友对象中同学、亲属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同事在农民工的交友对象中提高了24.29%。农民工非传统交友对象(除同学、邻居、亲戚、同事之外的交友对象)也增加了近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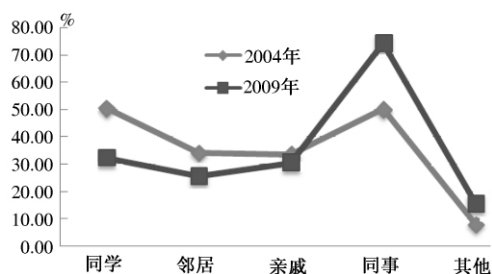


图4 农民工家庭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变化对比

社会交往生活方式转变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及深度,转变的评价标准可用接近市民的倾向和程度来衡量。在调研时感到:年龄在35岁以下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动性强于年龄在35岁以上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距离上更愿意接近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因为他们从事低质性的职业,社会地位较低,社会交往方式也只能围绕血缘、地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城乡结合部是他们聚集居住的主要社区。在社会层面上,农民工缺乏与北京市民深入交往的支持点。

6. 农民工家庭观念变化的对比

我们选择了农民工的婚姻观念和子女教育的数据对比,是因为我国农民长期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束缚,早婚、多生、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仍很强。农民家庭观念的改变,对于建设和谐的家庭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将有着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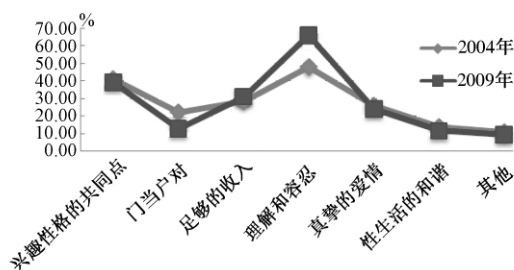


图5 农民工家庭婚姻变化的对比

在图5中看到：理解和容忍、兴趣性格的共同点、足够的收入、真挚的爱情是农民工对幸福婚姻定义四个主要因素。而在这五年的变化中，越来越多（上升幅度为18.13%）的农民工认为理解和容忍是婚姻成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这表明了农民工婚姻观念在进步，认同门当户对是婚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农民工已下降了9.35%；认同足够收入是婚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农民工上升了2.62%；而认同兴趣性格共同点、真挚的爱情、性生活的和谐是婚姻成功的主要因素分别下降了1.68%、2.06%、2.24%。可以认为，在现代农民工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婚姻观正在走向终结。

在家庭的重大决策（如子女升学、购买大件物品等）由谁做主问题方面：2004年丈夫单独决定家庭事务的比例为30.94%，2009年这一比例降低了11.83%；2004年妻子单独决定家庭事务的比例为7.19%，2009年这一比例为7.01%；2004年夫妻商量决定家庭事务的比例为54.03%，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为65.39%；2004年开家庭讨论会决定家庭事务的比例为7.84%，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49%；即夫妻商量和开家庭会讨论决定家庭事务的比例共增加了12%。夫妻商量做家庭决策比例的增大体现了农民工的家庭关系趋向夫妻公平、男女平等，开家庭会讨论决定比例的增多体现出现在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两者比例总和为73.88%，让我们看到现在的农民工家庭更加追求和谐了。

2004年认为没有必要和子女沟通的比例

达到31.34%，2009年这一比例降低到19.89%，比五年前减少了11.45%；2004年没有时间与子女沟通的农民工比例为11.34%，2009年该比例为8.99%，比五年前下降了2.35%；2009年经常与子女交流沟通的农民工比例为22.69%，2009年该比例为33.79%，比五年前增加了11.1%；2004年必要时与孩子沟通的农民工比例为34.63%，2009年该比例增加到37.33%，比五年前增加了2.7%。这说明农民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与孩子的沟通了，这是农民工教育观念进步的表现。

二、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们关注农民工多是从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即关注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进城后能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相对稳定的住所。因而，更多的研究视角放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保护农民工权益上^[3]。通过对在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转变的调研，我们又有进一步的认识：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视角看，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将与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相伴而行，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的认同，从心理上适应城市文化的价值取向，最后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研究的基础上，应拓宽关注范围，即关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农民生活方式转变的不同特征，以推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通过此次在北京的调研我们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分两个阶段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选择了“候鸟式”的流动模式。这种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双向流动是一种就业型的流动模式，这与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定居型流动模式有所不同。主要区别是：定居型模式的流动者在就业和收入上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对城市文化的认同程度或者说生活方式转变的质量要高于就业型的流动者。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选择了就业型模

式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目前,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多是就业型的流动者,遇到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他们就会返回家乡,当经济回暖,他们就会再次来到北京就业。

基于中国国情,我国农民工从就业型的流动者成为定居型流动者要经历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阶段: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转变。对于农民工来说,这三个层面的转变是依次递进的。首先,农民工进城后必须尽快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只有就业相对稳定,收入才能相对稳定,农民工才能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在初步完成了在城市的经济层面的稳定后,农民工才会有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需求。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地位、固有的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很难认同与形成城市里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来形成关系网络的,这使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在与老乡的交往中得到进一步固化。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速度快于“老生代”,但从整体上看,农民工在北京市的社会交往大多局限于职业关系。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最终选择定居型就业的决策,是他们在就业和生活中不断磨炼和奋斗中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在北京收入和职业相对稳定并依次完成了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并在三方面都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才会最终选择定居北京,从而成为定居型就业者即城里人;而那些收入和职业不稳定,视北京为就业和挣钱之地的农民工,最终还将返回农村,只能成为就业型流动者。

2. 科学文化素质是决定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

一个人的变化必须顺应环境。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变化具有时代的烙印,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感觉、直观的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情感、愿望、审美情趣构成了个人的综合文化素养,影响着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反过来又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素质。农民工文

化水平是其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科学文化素质是农民工自身全面素质形成的基础,也是不断提高农民工生产技能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前提。

在调研中深深感到以下几点是决定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1) 就业和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而文化素质是直接影响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和他的综合素养成正比,是他们消除生活中的陋习和提高审美层次,最终影响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条件。

(2) 农民工的科技素质是指在生产领域对现代科技的领会能力和掌握能力。多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致力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但因为我国农村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直接影响着他们接受新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能力,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工数量十分有限。农民工素质虽然在向更高层次发展,但变化缓慢,发生质的飞跃需要有一个过程。

(3) 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农民工素质的重要方面,决定着农民工的社会行为。调研中我们感到,我们对农民工所进行的道德素质教育无论是在流入地还是在流出地都非常欠缺。在他们的行为习惯中,封闭的小农文化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锐意进取的改革之心,由血缘和亲缘形成的家庭网络还在农民工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在农民工身上还比较普遍,处事中的短期行为还表现得比较突出。这些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式限制了农民工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限制了他们就业能力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进而影响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文化素质,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农民工未来生活方式目标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

一个封闭性的社会，具有社会化程度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事业不发达、精神文化生活设施欠缺、农民生活质量偏低等特征。我国农民长期积淀的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对外来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吸收能力弱和排他性强的特点。

从调研数据看，农民工与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仍有较大的距离，但从五年变化的数据看，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在悄然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农民工的传统生活方式正逐步被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代替，农民工已经逐步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生活方式转变。他们不再只满足基本的生存性消费，开始关注精神文化和娱乐服务的消费，消费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消费结构逐渐趋向合理。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步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他们越来越多地重视健康、科学文化知识和子女的未来，这些都说明他们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已经或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

(2) 在闲暇生活方式上，农民工已经逐步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进城打工终日为生计奔波，谈不上闲暇时间，即便是在茶余饭后，也大多聚在一起聊天，或靠打牌、饮酒来消磨时间。从调研数据看，五年来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在增多，闲暇时间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活动方式日益文明化。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等已经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上网、听音乐已经占据了比较多的闲暇时间，每个月用于娱乐和其他文化消费的比例在明显增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推广，农民工在闲暇生活方式的内容选择上还会逐渐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

(3) 在社会交往生活方式上，农民工在逐渐地改变传统农村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型生活方式，尽管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与北京市民的社会交往还局限于职业性的关系，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入还只是“嵌入”而不是“融入”，但我们看到，农民工在通过网络媒体多种途径的文化学习增

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正在逐步向开放型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转变。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他们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转变应具有理论研究的典型性。农民工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中国基本的、具体的国情，应该向着文明的、健康的、和谐的生活方式转变。文明的生活方式是指农民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应努力与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成果相适应，言谈举止和为人处世应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指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应有易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是指农民工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应有助于个人和家庭、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综上所述，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将驱动着农民工不断进行生活方式的转变^[4]。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中间很多家属还在农村，农民工和农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有着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状况还远远满足不了农村人口的文化需求，这些会影响农村人口对生活方式转变的主动意识。如果要加快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加大农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加大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力度，引导和推动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向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转变，并为整个农村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 [1] 方心清，王毅杰. 现代生活方式前沿报告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 王雅林. 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3] 郭星华，姜华. 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J]. 探索与争鸣，2009，(1).
- [4] 韩长赋.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齐明珠]